

云南乌铜走银技艺源起考辨^{*}

陈柏宇 田野

提 要：乌铜走银技艺是云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其起源时间，因缺乏实物鉴定研究，学界多依据《云南风土记》《石屏县志》等5篇文献的记载，认为其出现于清雍正年间（1722—1735）。然而，笔者经过对记载史料的逐一考辨，发现其中存在很大的纰漏，不足以支撑该说法。经对相关史料重新进行梳理和考证，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应在同治时期，伴随刻铜墨盒的兴盛而产生。

关键词：乌铜走银 技艺起源 年代考证 《云南风土记》

乌铜走银技艺是指在锻造好的乌铜片上篆刻图案，而后高温加热银块或银屑使其融化“走”满阴刻的凹槽，再经过打磨、抛光、捂黑等工序，最终形成一个黑白分明的乌铜器。该技艺是云南省特有的金属加工工艺，亦是西南地区金属加工工艺水平的典型代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技艺出现于清雍正年间，然而该说法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通过实物鉴定年代的相关研究缺失。目前并没有发现有清雍正时期，乃至其后一百多年间的乌铜走银器存世，故缺乏实物鉴定印证此说法。

第二，对史料的误读。目前发现记载乌铜走银的史料仅有《云南风土记》《昆明县志》《续修昆明县志》《石屏县志》和《新纂云南通志》5份文献以及民间传说，其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考证。同时，不同文献中相关时间和内容的记载存在偏差，缺乏相互的印证。

有很多研究乌铜走银技艺的学者直接引用该说法而不加考证，从而导致人们对于乌铜走银技艺起源时间产生了错误认识。为此，有必要对被认为记载乌铜走银技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从而重新审视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

一 乌铜走银技艺起源清雍正时期观点的形成

最早提出乌铜走银技艺出现于清代中期的观点来自许昆，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古代乌铜研究》（2003年）中，列举了《云南风土记》《昆明县志》《石屏县志》和《新纂云南通志》4份记载乌铜走银的文献。这4份文献以及《续修昆明县志》，是目前研究乌铜走银技艺历史的学者所依据的仅有的5份记载乌铜走银的资料。

其中，《云南风土记》被认为是5份文献中最早涉及乌铜走银的史料。许昆在他的论文参考文献中将《云南风土记》的写作时间标注为清乾隆时期。按照他的说法，“一般说生产早于记载”的，因此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清中期”^①。在他的另外几篇文章，如《云南古代乌铜走银》（2001年）和《云南古代乌铜成分和表面分析》（2003年）中，对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表述都较为隐晦，均称在清代中期。

^{*} 本文为昆明理工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台建设项目“艺术介入云南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路径与价值评估”（项目编号：KKKP201855006）、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人文社科类基金项目“非遗视域下云南民族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研究”（项目编号：2019Y0044）的阶段性成果。

^① 许昆：《云南古代乌铜研究》，昆明理工大学材料工程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页。

至于乌铜走银始于清雍正年间的观点,则来自李晓岑2003年发表的《云南的斑铜与乌铜走银》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乌铜走银)约创始于清雍正年间,为滇南石屏县的岳姓所创制。”^①并指出《云南风土记》中有大理产乌铜的记载。然而,为何说乌铜走银出现于清雍正时期,李晓岑并未说明。此后,不论是学界还是产业界,凡涉及乌铜走银起源时间的,均表述为清雍正年间而不加以考证,也无人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或质疑该说法。最终,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清雍正年间几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二 《云南风土记》的“走乌白铜”之辨

上述两位学者关于乌铜走银时间的考量实际上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一方面两位学者的证据过于单薄,仅以《云南风土记》中出现的只言片语推测乌铜走银技艺出现于清雍正年间过于武断。另一方面,两位学者在引用《云南风土记》时,对其写成时间和文中所指对象是否为乌铜走银器考证的都不够完善,甚至存在明显错误,具体如下:

其一,许昆指出《云南风土记》写成时间是清乾隆年间,并将其标注为“专著”。但据笔者查证,《云南风土记》实际是一篇千字左右的游记。纵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说明该文写于何时,更没有说明其写于乾隆年间,文章的内容也没有透露出任何其写成于乾隆年间的信息^②,故许昆所说的时间是否准确需要进一步考察。

经考证,《云南风土记》为张咏所写,后被王锡祺(1855—1913)收录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书中。该书始编于1880年,先后历经3次补编,于1898最终完成。^③关于张咏的生卒年月、何时何事来到云南均无从考证,王锡祺在书中仅介绍张咏为清太仓人。从记文内容可以看出,张咏对大理府的风土人情介绍的颇为详细,尤其文中提到“府署中有(桂树)四五本,书室云古山房,庭心二树,尤极丛茂”^④,可知作者曾亲自到过大理府。另据道光时期《云南通志·官制提名》记载:“大理知府张瞻洛,太仓人,乾隆二十八年来任。”^⑤故推测张咏很可能是于该时期和张瞻洛一起来到大理府的,因此《云南风土记》的写成时间应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之后。

其二,记文并未直接提及“乌铜走银”“走银”“乌铜”等名称,而是记载了每年三月中旬,大理西门外各种商贩汇集此地,兜售各种奇珍异宝,“如宝石、琥珀、翡翠、玛瑙、车渠、赤金、珍珠、风磨铜、缅甸锡、缅甸锦、珙琅、走乌白铜、象牙、象尾、五色石……”。何以两位学者将《云南风土记》作为记载乌铜走银技艺的文献呢?在许昆的文章中将原文的“走乌白铜”误引用为“青乌白铜”,并据此认为“乌铜走银器属于青乌白铜之类”^⑥。尚不论引用的正确与否,许昆在这里也并没有说明乌铜走银为什么属于青乌白铜之类。

那么,“走乌白铜”是否是指乌铜走银?或者是否包含乌铜走银呢?实际上这涉及句读问题。在《云南风土记》中,作者并没有给记文作句读。通过分析记文中的句读,有以下几种可

① 李晓岑:《云南的斑铜与乌铜走银》,《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2期。

② 参见张咏:《云南风土记》,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第7帙4册。

③ 参见刘镇伟:《再论王锡祺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补编〉》,《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4期。

④ 张咏:《云南风土记》,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第7帙4册。

⑤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1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⑥ 许昆:《云南古代乌铜成分和表面分析》,《云南冶金》2003年第1期。

能的情况:

- (1) “珐琅”“走乌白铜”;
- (2) “珐琅走乌”“白铜”;
- (3) “珐琅”“走乌”“白铜”;
- (4) “珐琅”“走乌、白铜”,即“珐琅”“走乌铜”“走白铜”;
- (5) “珐琅”、“走、乌、白铜”,即“珐琅”、“走铜”、“乌铜”、“白铜”。

笔者认为(1)中句读更为准确,“走乌”是来修饰“白铜”的。云南自古产白铜,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①堂螂县就位于现在的云南省境内。清代以来,白铜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专门生产白铜器的工厂。刘慰三《滇南志略》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迤西易门京铜局、白铜局、官铅店,布政兼管”^②。又据乾隆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白铜面盘,惟滇制最天下,皆江宁匠造之……白铜别器甚多。”^③由此可知,早在康熙年间云南就已大量生产白铜器物,且品类众多,流传甚广。所谓“走乌白铜”实际是白铜器上图案的刻痕内形成的深色铜锈,一般铜制器物成形以后都要经过打磨和抛光处理,表面呈亮白色,而图案的刻痕由于窄小,很难打磨到,遂仍保留着黑色铜质,于是黑色刻痕与光亮的白铜表面形成黑白对比,人们在观看时仿佛是乌黑的线条“走”出来的纹路,故称其为“走乌白铜”。

乌铜走银技艺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合金乌铜的配制。乌铜主要原料为紫铜,通过加入金、银等金属元素改变紫铜的物理特性,在与呈酸性汗液接触后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紫红色的乌铜转变成黑色。时间越久乌铜的表面就越黑,直至发亮,最终与“走”银的图案形成了强烈的黑白对比。二是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熔点进行镶嵌。两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否则乌铜走银技艺也就无从谈起。(2)(3)(4)(5)中的句读方式都很难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具体看来,(2)中“珐琅走乌”亦即“走乌珐琅”,字面理解为珐琅上“走乌”。珐琅本身就是一种运用于金属、陶瓷、玻璃等上面的装饰材料,再在珐琅上“走”乌岂不是多此一举。从两者的熔点来看,珐琅熔点一般在600—700℃^④,而铜的熔点是1084℃左右,乌铜尚未融化珐琅就已经融化了,根本不可能在珐琅上“走”乌铜。因此,排除了(2)中句读的可能性。

乌铜走银技艺所“走”之物为银块或银屑,有时用金代替银,称其为“乌铜走金”。(3)中“走乌”乃是一个动词,假使“走乌”就是“走乌铜”的简称,那么“走乌”于何物之上也并未说明,并不能够像“乌铜走银”“乌铜走金”“走乌白铜”这样完整的表述。因此,(3)中句读的方式本身就不能成立,故排除。

通览《云南风土记》全文可知,作者并不喜欢使用长句或并列句式。如作者在列举奇珍异宝时出现“缅锡缅锦”,若按照(4)和(5)的写作习惯,作者亦可以将此句写成“缅锡锦”或“缅锦锡”代替“缅锡缅锦”。同时,在此句中还出现“风磨铜”,作者也并没有将

① 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416页。

② 刘慰三:《滇南志略》卷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13,第73页。

③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之五《志器》,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11,第189页。

④ 参见苗建民:《扫描电镜对清代掐丝珐琅制作工艺的研究》,2002年中国材料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2098页。

它与“走乌白铜”并列，即写成“风磨走乌白铜”，来代指“风磨铜”“走乌铜”“走白铜”，或者“风磨铜”“走铜”“乌铜”“白铜”。又如作者在后面文章中写道“桂有三种曰银曰金曰丹”，若按（4）和（5）的写作习惯，作者亦应写成“桂有三种曰金银丹”。同样地，“走乌铜”“走白铜”“走铜”本身也并未说明走于何物之上。因此，也排除了（4）和（5）句读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云南风土记》中所记载的“走乌白铜”并非指乌铜走银器，乌铜走银器亦不属于走乌白铜之列，所谓“走乌白铜”实则是指白铜器和其表面的装饰图案。因此，《云南风土记》并不是记载乌铜走银的文献，故不能以此作为推测或考证乌铜走银技艺起源时间的依据。虽然清雍正时期云南冶金业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为乌铜走银技艺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但是至今并没有发现任何该时期的乌铜走银器存世，唯一依据的《云南风土记》中实际上也并没有记载乌铜走银器，故据此将乌铜走银技艺起源时间认定为清雍正时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至少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支持此观点。

三 地方志中乌铜走银技艺起源时间的界定

既然《云南风土记》不能够作为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清雍正时期的依据，其他4份文献是否能够找到证据来支持此观点呢？实际上，目前学界所发现的《石屏县志》《昆明县志》《续修昆明县志》和《新纂云南通志》4份文献成书时间要远远晚于清雍正时期，且大都没有记载乌铜走银技艺起源的时间。

（一）《石屏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历史上，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石屏县共修过8部志书^①，分别是：

万历二十六年（1598），萧廷对纂修《石屏州志》；崇祯元年（1628）顾庆恩纂修《石屏州志》；康熙十二年（1673）程封纂修《石屏州志》；康熙三十八年张毓瑞纂修《续修石屏州志》；康熙末年许贺来纂修《石屏志稿》；乾隆二十四年（1759）管学宣纂修《重修石屏州志》；乾隆四十五年吕缙先纂修《续修石屏州志》；民国2年（1913）袁嘉穀纂修《石屏县志》。

其中，袁嘉穀（1872—1937）于民国2—27年（1913—1938）纂修的民国《石屏县志》中首次出现乌铜走银技艺的记载，但仅阐释了乌铜走银技艺的特点和生产状况，并未说明这一技艺出现的时间。文中写道：“乌铜——以金及铜化合成器，淡红色。岳家湾产者最佳。按乌铜器始惟岳氏能制，今时能者日众。省市肆盛行，工厂中有聘作教师者。”^②

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信息：第一，乌铜走银技艺最初只有石屏县岳家湾岳氏所掌握。袁嘉穀生于云南石屏，并一直在此长大，笔者考察袁的相关著作发现，其青年时期曾创作长诗《异龙湖歌》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其中就提及乌铜器，诗云：“器精称乌铜，饭精称紫米。”^③该诗写于1890年前后，这是目前发现较早的且可以确定是提及乌铜走银的文献。结合对乌铜走银

^① 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袁嘉穀纂、孙官生编：民国《石屏县志》卷5，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第342页。

^③ 袁嘉穀：《异龙湖歌一百韵》，《袁嘉穀文集》第5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传承人的访谈^①，基本可以确定乌铜走银技艺发源石屏岳氏。第二，在袁嘉穀编纂《石屏县志》时（即1913年），乌铜走银技艺已在云南省内流行起来，且达到了一定规模。乌铜走银技艺传承人金永才（1953年生）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乌铜走银最鼎盛的时代是清末民初，当时昆明有二三十家店铺经营乌铜走银器。”^②这一说法基本与袁嘉穀版《石屏县志》内容相吻合。故可断定，乌铜走银技艺在清末民初之后达到鼎盛时期。

此外，笔者翻检管学宣版《重修石屏州志》（1759）和吕纘先版《续修石屏州志》（1780）^③，均没有乌铜走银技艺的记载。如果乌铜走银技艺在雍正年间就已在石屏地区出现，那两版县志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的。故笔者推测，乌铜走银技艺可能是在1780年之后才在石屏地区出现。

（二）《昆明县志》和《续修昆明县志》中的相关记载。《昆明县志》是清戴纲孙（也有称其为“戴炯孙”）于道光十六年（1836）着手编写，历时5年完成，光绪二十七年（1901）复印出版，命名为道光《昆明县志》。1925年，倪惟钦和陈荣昌共同纂《昆明县志》，同年刊印。但由于编纂的不完备，二人对其重加整编补订，后来顾视高总其事，将此修订版命名为《续修昆明县志》，1929年出版。^④

据许昆介绍，道光《昆明县志》记载：“其造墨匣及小件炉瓶，质如古铜，话（画）花纹字画以银片嵌入者，则为乌铜器，且又有乌铜走银器之称。”^⑤但笔者考证发现，此句实际出现于1925年修纂的《续修昆明县志》^⑥，道光《昆明县志》并没有出现此句，也没有乌铜走银器的相关记载。

据袁嘉穀版《石屏县志》记载乌铜走银技艺最初只有石屏岳家湾岳氏掌握，而后该技艺流传到各地。通览道光《昆明县志》，作者多次提到石屏，若该时期石屏岳氏已掌握了乌铜走银这一独特技艺或者乌铜走银技艺已在石屏地区出现，为什么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肯定的是，《昆明县志》并不能证明该时期昆明地区已经出现了乌铜走银技艺。

笔者考证发现，有文献记载昆明地区出现乌铜走银技艺是在1884年前后。罗养儒（1878年生）晚年将自己早年间在昆明地区的所见所闻记述成书，命名为《纪我所知集》（今改名为《云南掌故》）。书中曾有一篇专门回忆光绪十年（1884）后昆明的所有行业，其中写道：“有乌铜铺，专门生产乌铜墨盒及一切乌铜制品。”^⑦由此可知，在1884年前后，昆明地区已出现了乌铜

① 岳忠祥回忆，岳家先是在石屏做工，后在昆明开设乌铜走银店。参见王洪伟：《岳飞后代最后的乌铜走银传人》，《中华遗产》2005年第6期。按金永才先生所说，他的师父李加汝就是从岳氏后人处习得乌铜走银技艺的。参见曾文卉：《让“乌铜走银”一直“走”下去》，北京周报网，2012年7月12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9news/wenyu/zongheng/2012-07/12/content_467322.htm。袁昆林在采访中曾说，袁家的乌铜走银技艺是他的爷爷专门去石屏学的。参见余小舵：《乌铜走银农村有人——云南晋宁民间艺人袁坤林的困惑》，《农村实用技术》2010年第9期。

② 曾文卉：《让“乌铜走银”一直“走”下去》，北京周报网，2012年7月12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9news/wenyu/zongheng/2012-07/12/content_467322.htm。

③ 参见管学宣、吕纘先修，余孟良校注：《石屏州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

④ 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末。

⑤ 许昆：《云南古代乌铜研究》，昆明理工大学材料工程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页。

⑥ 陈荣昌、顾视高总纂，年四国校注：民国《续修昆明县志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421页。

⑦ 罗养儒著，李春龙等点校：《云南掌故》，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走银技艺。王洪伟^①与王东方^②两位学者，曾先后对乌铜走银技艺传承人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根据岳氏后人岳忠祥（1938年生）的口述，结合金永才的采访报道^③，以及存世的乌铜走银器实物，可将乌铜走银技艺的传承谱系追溯到清光绪初年（1875年左右）。其谱系如下：

第一代：岳忠祥的曾祖父，名字不详，约在清光绪年间于昆明活动。

第二代：岳忠祥的祖父岳恒康（约1875—1945）。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岳应（生卒不详），现有民国时期岳应款乌铜走银墨盒存世；陈鸿（生卒不详），现有光绪癸巳年（1893）款乌铜走银墨盒存世；潘（生卒不详），现有光绪丁酉年款乌铜走银墨盒存世。

第三代：岳忠祥的父亲岳顺宝（1905—1983）。

第四代：岳忠祥的堂兄岳忠明（生卒不详），资料记载在昆明的武成路民生街57号开设乌铜走银店铺^④，后把乌铜走银技艺传授给郎舅苏继承（1916—1962）；岳忠祥，1938年生，11岁时跟随父亲岳顺宝学习乌铜走银技艺；同时期的还有岳家店铺学徒李加汝（生卒不详）。

第五代：金永才（1953年生），李加汝的徒弟，现为乌铜走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岳忠祥的女儿岳丽娟（1972年生），从父亲岳忠祥处习得乌铜走银技艺。

此外，1990年云南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石屏县志》记载，至民国以后，岳氏后人岳忠明继承祖传工艺，并曾在昆明开设店铺生产和出售乌铜走银器，后因岳忠明无男嗣传于郎舅苏继承（1916—1962）。^⑤基本上与两位学者对乌铜走银技艺传承人的实地考察情况相一致。同时，两位学者实地考察的结果也印证了罗养儒《纪我所知集》中所记载的1884年昆明地区出现了乌铜走银店铺。由此进一步推断，乌铜走银技艺应于光绪初期传至昆明。

（三）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中的相关记载。1931年，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案重修省志，由周鍾岳等人主持编纂《新纂云南通志》，于1944年修纂完成并付印。^⑥此次修纂省志还邀请了秦光玉、袁嘉穀、方国瑜、方树梅等精通云南史籍的学者担任编审。在此之前，几位先生都曾有云南省历史研究的相关著述问世，尤其是在云南省的方志编修和史料整理方面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新纂云南通志》中也没有提到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及相关的史料信息。原文仅记述：“乌铜器制于石屏，如墨盒、花瓶等，篆刻花纹或篆、隶、正、草书于上，以银屑铺篆刻花纹上镏（熔）之，磨平，用手汗浸渍之，形式古雅，远近购者珍之。”^⑦

由此可知，此前仅有的5份被认为记载乌铜走银的文献中，乾隆时期的《云南风土记》和道光时期的《昆明县志》（1836—1841）实际上并没有涉及乌铜走银的相关内容；《石屏县志》（1913年始修）、《续修昆明县志》（1925年始修）和民国《新纂云南通志》（1931年始修）3种地方志虽然记载了乌铜走银技艺的相关内容，但是并没有直接提及起源时间。从这些地方志的书写的时间可以看出，最早记载乌铜走银技艺文献的是袁嘉穀1913年始修的《石屏县志》。从此版县志可以了解到，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石屏，在清末民初之后达到鼎盛时期，这一点从乌

① 参见王洪伟：《岳飞后代最后的乌铜走银传人》，《中华遗产》2005年第6期。

② 参见王东方：《乌铜走银的造型、装饰与传承》，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7页。

③ 参见曾文卉：《让“乌铜走银”一直“走”下去》，北京周报网，2012年7月12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9news/wenyu/zongheng/2012-07/12/content_467322.htm。

④ 参见王洪伟：《岳飞后代最后的乌铜走银传人》，《中华遗产》2005年第6期。

⑤ 参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第25编《人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⑥ 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末。

⑦ 周鍾岳：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7，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铜走银传承人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根据梳理出的乌铜走银技艺传承谱系和罗养儒的《纪我所知集》中的相关内容可推断,乌铜走银技艺应于光绪初期传至昆明。

四 乌铜走银技艺源起再辨

至于乌铜走银技艺起源的时间,笔者认为它是在刻铜墨盒出现之后(即同治时期)产生,并随着刻铜墨盒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刻铜墨盒的衰落而衰落。其发展经历了刻铜墨盒、铜走银墨盒和乌铜走银墨盒3个阶段,而后衍生出其他乌铜走银器物。

首先,从两者记载资料的时间顺序来看。目前所发现的有关乌铜走银的记载都是在光绪之后,且记载中都会专门提到乌铜走银墨盒。如罗养儒《纪我所知集》提到“铜墨盒及一切乌铜制品”。《续修昆明县志》记载:“其造墨匣及小件炉瓶,质如古铜。”《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乌铜器制于石屏,如墨盒、花瓶。”这一方面反映了乌铜走银墨盒在当时比较受欢迎,另一方面笔者推断乌铜走银技艺最早就是制作墨盒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即落款陈鸿的光绪癸巳年的乌铜走银墨盒)和最多的乌铜走银器都是乌铜走银墨盒了,并且都是在刻铜墨盒出现之后才出现的。

就墨盒自身而言,其大致出现于道光年间(1821—1850),而刻铜墨盒的盛行则认为是在同治初年(1862年前后),以陈寅生(1830—1908)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万丰斋墨盒店专营铜墨盒为标志。^①乌铜走银墨盒改变了普通墨盒的材料,采用可以“捂黑”的乌铜。同时,在刻铜的基础上加入了“走”银工序,其技术难度要远大于普通的刻铜墨盒,故乌铜走银墨盒晚于刻铜墨盒出现,在时间关系上是符合逻辑的。若乌铜走银技艺在刻铜墨盒之前出现,那么势必会有乌铜走银技艺的相关记载和其他乌铜走银器存世。

其次,从乌铜走银技艺产生的动因看。乌铜走银产生于石屏被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其提供了连续不断的原材料;二是独特的金属加工工艺为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三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②在金属的储存量和丰富性方面,石屏地区远不如东川、会泽、蒙自、武定;在加工工艺方面,东川的斑铜、个旧的锡器、永胜的珐琅也在其之前。按道理,乌铜走银技艺更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出现,故笔者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文化的影响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据袁嘉穀版《石屏县志》记载:“石屏自元至正年间建文庙,立庙学,建学设科,人才辈出。明清两代文教诞敷。”^③在明朝初年,为了边疆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统治者把中原地区的王公贵族迁徙到西南地区,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公贵族大部分来到了今天的石屏地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读书兴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民间不问贫富之家,皆以教子读书为荣。”^④据统计,明清两代,石屏县出现了翰林16人、文进士65人、文武举人638人、贡生700余名,以及云南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穀,仅次于昆明和大理。^⑤因此,文房用具的需求量相对其他地区要多,生产文房用具的工艺相较于云南其他地方也就发展的更快些。故当北京刻铜墨盒在文人之间受到追捧的时候,石屏的铜匠便开始模仿他们制作刻铜墨盒。

① 参见谢松岱:《论墨绝句》,转引自周继烈:《说刻铜墨盒》,《荣宝斋》2000年第5期。

② 参见王东方:《乌铜走银的造型、装饰与传承》,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 袁嘉穀、孙官生编:民国《石屏县志》卷7,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④ 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第18编《教育志》,第518页。

⑤ 参见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第18编《教育志》。

“一件艺术水平极高的刻铜艺术品，应该是书画家与刻铜高手相互沟通、神志暗合的产物。”^①相较于北京等地刻铜墨盒往往是书画家和刻铜高手结合的产物，石屏地区的铜墨盒更多是由工匠单独创作，故在篆刻的艺术性上要略逊于他们。于是，深谙金属属性的工匠尝试在技术上改进刻铜墨盒以弥补这一缺陷，他们借鉴了景泰蓝工艺——在金属胎上做好纹样，在图案内填上珐琅料，然后高温加热使其硫化并与金属外壁结合在一起，再经过磨光、镀金等工序呈现出宝石镶嵌的效果。乌铜走银则是高温加热银，两者在原理上是一致。乌铜走银的匠人喜欢把乌铜走银与景泰蓝作比较，将两者并称为“天下铜艺双璧”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之所以用银代替珐琅，一是珐琅的配方民间当时尚未普及，直至“清朝晚期，随着皇室工匠的流失，景泰蓝工艺开始‘移居’民间作坊”^②；二是银作为“金银铜铁锡”五金之一，历来受人们青睐，与金相比，其熔点与铜的熔点相差较大，便于“走”的工序。与锡相比，银的质地更为坚硬牢固。

为了使所“走”银能够很好地与铜结合在一起，于是在纯铜里面加入微量的银等金属元素，这样高温融化银的时候，铜里面的银也处在融化的状态，两者就能够牢固的焊合在一起。一次，匠人在炼铜时不小心将自己的金戒指掉进了融化的铜浆中，虽然很着急，但无奈戒指很快融化，也只能继续加工，就这样第一件乌铜走银器——墨盒诞生了。而后匠人不断改善，使得乌铜走银技艺日趋成熟，乌铜走银墨盒也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求购者络绎不绝。于是岳家于光绪初年在昆明开设了乌铜走银店铺。这就是为什么岳氏后人的回忆和资料的记载都是在光绪之后。

最后，从刻铜墨盒与乌铜走技艺的发展轨迹来看，两者也基本一致。同治时期（1862—1874），乌铜走银伴随着刻铜墨盒盛行而出现，于光绪初期（约1875—1884）在昆明开设店铺，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出现了岳应、岳炳、岳永康、岳顺宝、岳忠明等代表人物。而这一时期刻铜墨盒也迎来自己的第二高峰，出现了张樾丞、张寿丞、姚锡久、孙华堂等刻铜艺术家。周继烈曾指出：“同光时代是第一个刻铜墨盒的辉煌期，民初到四十年代是第二个辉煌期，此后墨盒实用价值日渐被新型文具取代，刻铜墨盒几近消亡。”^③而也正是在1940年左右乌铜走银技艺逐渐衰退。资料记载，龙云执政云南期间就经常订制乌铜走银墨盒赠予他人；1936年，个碧石铁路通车也订制了专门款的乌铜走银墨盒。^④在这之后，随着墨盒被新型文具所取代而渐趋衰退，乌铜走银墨盒以及其他乌铜走银器也渐渐销声匿迹，直到近十几年，才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同治时期（1862—1874）的石屏，伴随着刻铜墨盒的兴盛而产生，光绪初期石屏岳氏在昆明开设乌铜走银店铺，清末民初乌铜走银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在1940年左右逐渐走向衰退。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① 范大鹏：《铁笔翰墨他年重 更累人间拓冷铜——刻铜文房发展史上的几位重要人物》，《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2年第11期。

② 李林琳：《清末民国景泰蓝兴衰之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页。

③ 周继烈：《说刻铜墨盒》，《荣宝斋》2000年第5期。

④ 参见王东方：《乌铜走银的造型、装饰与传承》，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